

---

#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回顧： 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傳統

趙庭輝\*

---

## 摘要

本文主要回顧且批判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關於媒體與文化研究，及其所擴展開來的英國媒體研究領域之思想脈絡、理論建構，與學術貢獻。對這樣的主題來說，本文具有相當程度的歷史與地理特殊性，一方面按歷史發展的進程，描繪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演變；另一方面則將論述的焦點置於英國境內，也就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累積的媒體與文化研究成果。本文的詮釋進路是以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思想軌跡為起點，追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思維論辯；進而探索該領域的理論脈絡，包括理論建構與學術貢獻；然後，討論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發展，著重 1990 年代之後的理論觀點；最後，說明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建制，同時亦解釋改制後的文化研究學系之進展。

**關鍵字：**媒體與文化研究、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次文化研究、文化霸權、文化資本、閱聽眾分析

---

\*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壹、前言

本文主要旨趣係針對對廿世紀中葉以來，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發展作一回顧。這樣的回顧誠為相當繁複的工程，基於篇幅受限，且為求論述更有重點，討論範圍界定於英國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與獨立後的文化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之媒體與文化研究傳統，以及因為這個傳統所擴散開來的媒體研究學術領域，同時說明目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相關學術建制與發展。<sup>1</sup> 在這些論述中，特別強調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理論建構與學術貢獻，並對整個思潮的演進，例如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論辯，以及媒體研究與階級、種族、青少年，與性別議題的關聯等等，進行探討。

S. Moores（1991）指出，英國媒體研究的分野有三大派別，一是以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為主的文本分析，研究者以 *Screen* 期刊為他們發言的空間；二是以李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為主的政治經濟學取向；最後是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本解讀與閱聽眾研究。這個說法，一方面相當清楚地勾勒出英國媒體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亦釐清本文的立場。本文除了論述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媒體與文化研究之外，並不特別對文本分析或政治經濟學多所著墨。如此一來，似乎陷於「窄化」文化研究的危險，但是相信這樣的處理方式，較有助於梳理本文立論的脈絡。

本文主要分成六個部份。前言說明本文的主要目的與內容。接著，描繪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形成的思想軌跡，主要受到當代文化

研究中心思維論辯演進的影響，特別是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學術爭議，以及歐陸文學與文化理論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衝擊。再者，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媒體與文化研究成果為經，同時以其所擴展開來的學術研究為緯，回顧且批判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理論脈絡與貢獻，相當著重媒體研究與階級、青少年、種族，與性別議題的關聯。更進一步地，闡釋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發展，尤其是法國文化社會學家 P. Bourdieu 的理論觀點，在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實際應用。同時，描述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建制，強調媒體研究在英國境內的學術擴展，以及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改制為文化研究學系之後的種種變化。結語則藉由此一回顧與批判，提供媒體與文化研究反省和思考的空間。

## 貳、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思想軌跡

英國文化研究從 1964 年在學院中建制化之後，就一直以流行文本與媒體為其操作的場域。英國文學教授 R. Hoggart 在伯明罕大學的英國文學系（School of English）建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兼主任，1965 年於其就職演說中，揭示了文化研究關注的，是主流學科中忽略的或是原本在英國無人研究的媒體和流行文化等議題，他指出，文化研究從事的是歷史、哲學、社會學，和文學評論的學術工作。Hoggart 的主要貢獻在於替文化研究的學術計劃釐定清晰的藍圖，即文學是瞭解文化的基礎，要真正理解社會的本質必須從文學文本著手，同時，文學批評是可以擴展至流行藝術或媒體的分析，以瞭解社會意義。<sup>2</sup>

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許多文學研究者早已開始反省且批判工人階級文化在菁英學術中付諸闕如，Hoggart 與 R. Williams 是其中的主要人物。<sup>3</sup> Hoggart 在 1957 年的 *The Uses of Literacy*

中指出，文學評論必須要尋找文學作品的文化意義，無法再閉門造車。Hoggart 對於通俗文學的重視，是深受傳統文學訓練出身的他最大的特色，極力批判以往文學評論中讚揚高級文化（high culture）卻貶低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作法，Hoggart 使用分析文學的方法來分析報章雜誌等流行媒體，他亦研究 Leeds 市的礦工生活文化，強調工人階級研究的必要性。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後，積極投入流行文化的定義工作。Williams 早期在 1958 年的 *Culture and Society*，已經成為英國文化研究的經典之作，Williams 拓展了文化範圍的界定，他將被限制在文學評論的範疇且採取菁英觀點的文化，延伸至工人階級文化的形構。就方法論建構而言，*Culture and Society* 捨棄原來狹隘的文學觀點，為未來文化研究朝向人類學與民族誌（ethnography）發展立下根基。為繼續衍伸這個觀點，Williams 在 1965 年的 *The Long Revolution* 中提出進一步的看法，他認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體現（ways of living），同時是每個歷史時期的長期累積與建構，人們對於每個歷史時期都具有不同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藉由意識型態的建立產生對社群的凝聚力。

對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界定流行文化的關切範圍在於工人階級的發言位置上，E. P. Thompson 的確功不可沒。與 Hoggart 和 Williams 不同的是，Thompson 以社會歷史（social history）角度著眼，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階級作出挑戰，他在 1963 年出版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一書中，追溯英格蘭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軌跡。對 Thompson 來說，階級的形成並非是經濟物質原因所導致，他強調應該將階級放置在一個更廣的文化傳統架構中來觀察與分析，如此一來，階級並非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而是隨著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建構而成。

這三位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為流行文化釐

定研究計劃。然而，在英國文化研究歷經了文學批評至文化批評的階段中，其停留於文學批評的時間甚短，即由文學批評轉向文化批評，理論基礎的建構仍舊相當薄弱，許多關於流行文化的研究議題沒有確立，這樣的轉變使得初期的英國文化研究僅止於思想的啟發，並未見到豐厚的理論觀點、研究方法或實際的研究作品。這必須等到 Hall 在 1969 年真除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後，因為發現在進行實際文化研究，英國本土理論的貧困，所以大量引進歐陸當時已相當完備的文學與文化理論，充實與建構這個新興領域的理論基礎。<sup>4</sup>

Hall 對於英國文化研究發展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大量引進歐陸的文學與文化理論。從初期的理論貧乏到 1970 年代後期，英國文化研究者熟知許多歐陸結構主義的文學理論，例如，F. de Saussure 的語言學分析；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例如，L. Althusser 的意識型態分析；精神分析的文化理論，例如，J. Lacan 的鏡像理論與主體理論；以及符號學的文化分析，例如，R. Barthes 與 U. Eco 的論點等。然而，此舉反而引起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學術思想上的爭執，起因在於英國本土的文化主義者不滿歐陸結構主義者的論點而點燃戰火，引爆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論辯。

這場學術論辯導致相當大的爭議，主要關鍵在於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建構問題，特別是在媒體與文化研究這個領域中。許多以 *Screen* 學術期刊為主的文本分析者接受歐陸結構主義思潮的啟迪，充份運用語言學、符號學，以及精神分析理論，研究電影與電視文本如何建構主體性，而與文化研究傳統中的媒體研究分道揚鑣，形成獨特的研究取向。相對地，堅持文化主義傳統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則開始建構本身的方法論，特別是 P. Willis（1980）的 *Notes on Method* 一文，借用源自人類學的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方法，結合意義生產的再現（representation）系統與表意

( signification ) 系統分析觀點，對文本讀者與閱聽眾如何透過社會實踐，建構本身的文化認同以及產生文化意義進行研究。

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因而陷入理論觀點與方法論的兩難困境。結構主義被視為是外來的理論觀點，將流行文化形式當作建構主體性的機制，例如，結構主義的意識型態分析特別注意文本的語言表意系統，關切文本結構的組織與形式而非產品本身，同時也注重文本內容在接收過程中如何進行主體性建構，而符號學成為文本分析最合適的研究方法之一，這種觀點深受文學背景出身的研究者歡迎，並專注於電影、電視和流行小說的文本解讀。然而，這種完全孤立於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之外的結構主義，對文化主義來說，仍然是相當難以接受。

文化主義將流行文化或媒體視為意義鬥爭的場域，工人階級或處於邊緣地位的社會群體，藉由對流行文化形式的使用與文本解讀等實踐過程，產生文化意義，建構文化認同，與布爾喬亞 ( bourgeois ) 階級或位於中心地位的社會群體，進行抗爭與妥協，所以，文化主義相當傾向於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分析。

雖然以文化的政治性 ( politics ) 來說，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都同意一個相當類似的結構概念，即流行文化和意識型態被看作是社會階級之間敵對的政治與經濟關係，這是由主流意識型態所支配的。另外，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都將流行文化和意識型態，當作是布爾喬亞文化與工人階級文化對立與妥協的場域。但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對主體性的建構，在認識論 ( epistemology ) 上有極大差異，導致在研究方法與分析推演大異其趣。事實上， Gramsci 提出的文化霸權 ( cultural hegemony ) 概念，或許是化解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爭議的法寶，而這個概念亦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用以取代 Althusser 的意識型態。因為流行文化被認為是社會權力關係形成的場域，同時，布爾喬亞與工人階級是一種霸權的妥協，而非對立的

關係，主流意識型態不會單純是布爾喬亞階級的，總是不斷在妥協中達成，以贏取共識（consensus）。

Hall（1982）的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一文就是最好證明，Hall 企圖結合 Althusser 與 Gramsci 的觀點於媒體論述中，不但解決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在媒體研究的矛盾與緊張關係，同時亦將初期以結構主義為主的立論重心導向以文化主義為主的媒體與文化研究。另外，Hall 也在 1986 年時寫作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承認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同時存在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但最終結構主義仍為文本分析者吸納，與堅持文化主義的文化研究者分道揚鑣。

1970 年代末期，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再次遭遇歐陸後結構主義思潮的衝擊。法國學者 M. Foucault 在 1979 年所寫的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重新解釋知識與權力的歷史關係。Foucault 以現代監獄的形成與懲罰制度，論述獄卒如何透過 panopticon 的監視裝置，悄悄地控制著監獄內囚犯的行動。他認為，當代社會的權力表現方式，如同現代監獄與懲罰制度，監視所有的社會公民，其手段就是運用一整套觀察、監督和偵查制度來進行強制，但強制本身則是隱密的，必須透過論述才能揭示這種不易查覺的性質。

1980 年代以來，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首先與書寫理論（writing theory）相遇，並受到這些理論觀點的啟發，J. Derrida 的書寫理論關切再現的問題，開啟解構理論（deconstruction）而在西方思想界享有盛譽。從 1980 年代開始，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亦遭遇後現代主義理論（postmodernism）的挑戰，J. F. Lyotard 在 1984 年的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中，否認後現代社會中具有真理，並論述後現代情況中的知識分配狀況。F. Jameson 在 1991 年的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結合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

義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消費進行批判。而 J. Baudrillard 提出擬仿 (simulation) 的概念，將媒體當作結構化的擬仿機器，指出過度膨脹的資訊超載，造成內爆 (implosion)，而透過擬仿、真實，與符號之間的界限消失，當代社會已被形塑成一種超真實 (hyperreality) 的世界。

後現代主義理論不但顛覆結構主義中關於真實與符號之間聯繫的傳統論點，同時亦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主體性建構方面帶來空前未有的挑戰。然而，後現代主義理論對於以文化主義與主體性為傳統的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其影響力遠不及於同一時期的法國文化社會學家 P. Bourdieu 的消費論述。事實上，Baudrillard 早在 1960 年代後期，就開始討論大眾消費社會來臨的問題，由於消費性財貨與勞務大量增殖，主體已開始被客體的物質世界所吸引與蠱惑。Baudrillard 意識到物品消費所佔據的重要地位，後現代社會的一切消費都只是象徵符號的消費，意義僅誕生於吸引消費者注意的符號或象徵系統之中，消費者重視的是符號意義的消費，而不再以物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

然而，真正開始在 1990 年代以後影響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特別是在閱聽眾分析領域的是 Bourdieu 關於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與品味 (taste) 的概念。<sup>5</sup> Bourdieu 在 1984 年的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中，將原本屬於經濟層面的階級討論，即經濟資本 (economic capital) 擴展至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擁有經濟資本者有較多財務能力接受教育，因為接受教育而獲得文化資本，並培養出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發展出屬於該階級的文化品味，所以和其他階級有區別 (distinction)。<sup>6</sup>

Bourdieu 最大的貢獻，在於試圖聯結經濟與文化兩個領域，不但在理論上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同時，



Bourdieu 在階級身份團體與消費論述的實用經驗取向上，贏得以文化主義與主體性為傳統的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者青睞，大量被應用至實際研究中。再者，Bourdieu 早期在 1972 年的 *The Berber House* 一文中，針對公共與私人空間與性別領域的討論，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 1980 年代中期的傳播科技使用與消費研究取向契合，成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廿紀末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至今，文化主義仍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者所堅守，持續關切文化認同與主體性建構，特別是探索如何藉由流行媒體之形式與文本，以建構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可能。由於堅持這個傳統，使得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發展出迥異於文本分析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除了在理論思潮的演變中遭遇到歐陸結構主義的影響，在研究議題方面，亦因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持續地受到種族、階級、青少年與性別等四大研究領域的介入而得到擴展。一方面，種族、階級、青少年與性別等研究議題，將媒體視為主要的操作場域；另一方面，媒體研究也獨立發展且以這四大取向為立論重心，彼此相互補足與滲透。同時，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仍然重視實際性的議題分析與批評，深深具有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色彩。<sup>7</sup>

接替 Hall 擔任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中心主任的 R. Johnson，1983 年在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一文中，闡明文化研究的重心，亦再次澄清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傳統。對 Johnson 來說，文化是具有社會差異（social difference）的不同社群意義建構的過程，是橫向與縱向交叉貫通個人、社會與文化脈絡的實踐。Johnson 指出，以橫向來看，文化是組織社群關係的結構過程，文化的產製與衍生和階級關係和社群的階級關係有關，同時不斷地建構於性別、種族，以及年齡的差異中，文化因此是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衝突。相對地，以縱向來看，這些社會範疇之間產生的不平衡關係，對於個人體會

實際生活經驗的人文環境產生差異，造成個人對世界的反應、詮釋與實踐都有不同。Johnson 的說法，相當程度地反映出英國媒體與文化的研究立場與取向。

### 參、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理論脈絡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濫觴，在於對流行媒體形式的確認。Hall 在進入且領導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間，不斷地透過文本表意系統運作的語言學和符號學分析，論述媒體、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之間的接合關係。最重要的是，關於其他次文化（subculture）的研究亦逐漸興起，如工人階級、性別、青少年和種族等，這些次文化研究大量挪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民族誌方法，瞭解每日生活（everyday life）的實踐，不但探索各種次文化的問題、檢視次文化的建構過程、次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次文化之間進行對抗與吸納的歷史過程，而這些次文化的實踐皆以媒體為主要場域。

Hall 的第一本書 *The Popular Arts*，是與 P. Whannel 合著，1964 年首度在英國出版，深受 R. Hoggart 和 R. Williams 的影響。Hall 和 Whannel 主要目的在於建立獨特的架構，處理有關流行文化形式的問題，換句話說，研究者必須注意流行文化形式的特質，如影像媒體的視覺特性等。

Hall 和 Whannel 最大的貢獻在於，為要證明各種媒體產品，發展出一套分辨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方法，他們認為流行文化衍生自民俗文化（folk culture），同時仍然存在某些藝術成份，而大眾文化則不是衍生自民俗文化，缺乏文化動力。

對於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來說，*The Popular Arts* 是界定實際媒體研究藍圖與計劃的開始。顯然地，關於流行媒體形式的確認，刻意與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大眾文化與文化工業

( culture industry ) 保持距離。這種對流行媒體形式的廣泛論述，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持續發揮作用。與 Hall 和 Whannel 不同的是，R. Williams 在 1974 年出版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轉向描繪單一媒體的特質。Williams 主要目的在於論述電視作為一種科技，是如何透過電視工業的生產，以及人們在家庭情境中的使用，而成為文化形式。

Williams 的貢獻，是對於日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落實到閱聽眾分析時具有思想上的啟發，特別是電視媒體接合公共與私人領域的效果。另外，Hall ( 1975 ) 的 *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則是繼 Williams 之後，關於電視媒體相當重要的論著，Hall 從電視科技著眼，探索電視的美學形式與社會使用，同時與電影作一比較，藉此討論電視科技的文化政治問題。這些論著都是在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分析對象界定範圍，也就是專門以影像或視覺媒體為主。

Hall 在 1980 年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與英國 Unwin Hyman 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第一本論文合集 *Culture, Media, Language* 中，關於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整個 1970 年代的發展指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對於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典範 ( paradigm ) 有四項突破。

首先，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打破直接影響的模式，這是一種簡單地使用刺激與反應的模式，亦是行為主義的，使得分析架構轉向媒體的意識型態角色。接著，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挑戰媒體文本是意義透明的 ( transparent ) 攜帶者之觀念，使得傳統的內容分析形式，改變成媒體文本的語言學和意識型態建構。此外，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打破被動與沒有差異的閱聽眾概念，這種閱聽眾的概念曾在傳統研究中大量出現，受到廣電組織與廣告代理商的調查需要所影響，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將這些過於簡單的觀念，以更主動的閱

聽眾概念取代，瞭解媒體訊如何被製碼（ encoded ）的解讀與關係，及被製碼的文本與閱聽眾解碼（ decode ）的變化情形。最後， Hall 認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將媒體與意識型態問題，回歸到媒體在維持主流意識型態定義和再現時，所扮演的角色。

根據 Hall （ 1980 ）的看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最早的媒體研究，是探索媒體與社會變遷廣泛的歷史運動的關係。這個名為 *Paper Voices* 的研究計劃是由 The Rowntree Trust 提供經費的研究計劃，主要分析 193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中期，英國的流行報業與社會變遷。第二個媒體研究計劃，則是對電視 crime drama 的研究，這種關於電視與暴力的研究亦是李斯特大學建立 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的基礎，這個媒體研究計劃，主要集中分析電視 crime drama 的文本，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報告的形式出版。

在 1970 年代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本關於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博士論文，是由 T. Millum （ 1975 ）所撰寫的 *Image of Woman* ，這是以視覺媒體的廣告再現為分析對象。根據 Hall 的看法，這篇著作的價值，在於它是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首度以這個主題進行的論文，亦是第一個以視覺論述作為中心要旨。另外，具有相當指標意義的是一項名為 *Cure for Marriage* 的集體研究計劃，分析英國當時極為流行的女性雜誌，試圖瞭解女性和陰柔特質（ femininity ）是如何在這些雜誌中再現的；這篇作品的貢獻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首次以 C. Lévi-Strauss 的神話研究與 R. Barthes 的觀點，使用女性雜誌素材作為分析對象的研究，這個研究一方面影響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媒體研究領域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標誌著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陰柔特質再現問題上的興趣，可惜本研究僅留下手稿，未正式出版。

Hall 論到 1970 年代的媒體與文化研究，將研究興趣轉向政治傳播的議題，主要原因是新興電視媒體的優異特性，加上越戰的影響。這使得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從對流行娛樂的關切，轉而檢視媒體與政

治議題。例如，Hall（1971）的 *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一文，就是在論述媒體與政治的權力關係，同時亦闡釋媒體透過那些機制，定義何種社會群體是合於主流價值的正常者，與違反主流價值的偏差者。另外，則是相當關切電視新聞與公共事務節目（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例如，Hall, et al.（1981）的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一書，主要是在分析英國 BBC 的公共電視節目 *Panorama*，討論媒體的公共事務節目如何再現國族統一的觀念。針對這些議題，當代文化研究運用的理論觀點與批評，仍然是來自文本分析的符號學方法，特別是關於新聞、新聞圖片，以及新聞產製過程的新聞價值與主流意識型態，著墨甚多。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最重要的媒體研究計劃，是 Hall 在 1973 年所撰寫的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一文，這篇文章被視為是從結構主義分析邁向文化主義分析的轉捩點。Hall 主要目的，是宣稱與美國傳播研究劃分界線，對於美國傳播研究的美學價值採取懷疑的態度，同時承認閱聽眾在消費流行文化時，具有主動的發言位置。對 Hall 來說，閱聽眾所使用的語言或非語言傳播系統，都會事前替閱聽眾製碼，電視作為一種語言媒體，它的論述符碼因此也是事先建構完成的，閱聽眾相當瞭解這些符碼，所以它們顯得特別自然。然而，Hall 的看法是，這些單純的視覺符碼，都具有某些文化層面的特殊性，因為它們已相當自然化（naturalized），導致符碼的製碼實踐都是一種偽裝的過程。所以，為要鬆動這些自然化的視覺符碼，必須經過閱聽眾的解碼，重新詮釋符碼的社會意義，對於屬於不同社群的閱聽眾來說，在接收電視訊息時必定會產稱不同的解讀。

Hall 最大的貢獻，在於指出符號的真實意義，並非由電視媒體的語言結構與形式產生，而是透過閱聽眾的解讀實踐，這樣便徹底地將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接合起來，同時特別注重文化意義的詮釋

層面。然而，Hall 遇到的問題是：在不同閱聽眾解讀電視訊息時，既然所有的電視符碼都是依照規範化的符碼組成，閱聽眾有可能跳離製碼者的意圖之外，另外找到不同的解碼方法嗎？Hall 的解釋是，電視訊息可能是多義的（polysemic），但不完全是多元的（pluralistic），也就是說，閱聽眾的開放性詮釋仍是有所限制的。根據這個論點，Hall 借用 F. Parkin 的觀念，主張閱聽眾在解讀電視訊息時，會建構出三種不同的立場，即主導與霸權立場（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或偏好閱讀立場（preferred reading），閱聽眾完全接受電視訊息；協商立場（negotiated position），閱聽眾採取協商式的解讀，接受部份電視訊息；以及反對立場（oppositional position），閱聽眾完全排斥電視訊息。雖然，Hall 的製碼與解碼模式是相當理論上的推理，並沒有得到實際研究的支持，但卻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的閱聽眾領域的發展具有長遠的貢獻。

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確立流行媒體形式，以及開始進行媒體研究的同時，關於階級議題與意識型態分析，亦是從歐陸引進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並與文化主義接合。事實上，英國文化研究誕生於伯明罕大學，實在與伯明罕本身的都市特徵有很大的關係。雖然，這廿幾年來，伯明罕極力蛻變成一個堪與倫敦媲美的現代化都市，至少在廿世紀初期至中葉，身為鋼鐵業與機械製造業集散地的伯明罕，是工人階級群聚之地。<sup>8</sup> 除此之外，階級議題與意識型態分析受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重視，與英國社會學的學術興趣有重大關聯，特別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辯。然而，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經濟物質論述著眼，卻意圖閃躲傳統馬克思主義在階級與意識型態論證的僵化形式，尤其在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與下層結構（basestructure）的區別。

Hall 大量引進歐陸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是快速且立即的，這包

括階級、階級意識、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等概念，成為探索工人階級如何形成主體性，藉以在主流社會尋得建構自我意識文化可能的主要理論架構。其中最重要的理論主導力量來自 Althusser，因為 Althusser 對英國文化研究或媒體領域的影響，在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和主體性（subjectivity）兩個概念上，特別是主體性建構的概念，對於文化研究在上層結構的解釋產生重要的影響和貢獻。

最早應用 Althusser 的意識型態概念在媒體研究上，是 E. Heck（1974）的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Media Messages* 一文，主要探索意識型態概念如何用以詮釋媒體文本，這篇初探性的研究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關於意識型態的分析奠定基礎。

事實上，最重要的論文應屬 Hall 在 1977 年的 *Cultur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一文，這篇文章使得媒體與文化研究在詮釋意識型態的操作時，將其重心置於媒體文本的分析，然而，無法符合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計劃，特別是 Althusser 原本就忽略對社會情境的研究，使得 Althusser 經常被批評為是方法學上的狹隘文本主義者。

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來說，關於意識型態的某些弱點，在理論的應用上產生相當程度的困難，關鍵問題是主體性的文化建構動力在意識型態下消失。1970 年代後期，Gramsci 的文化霸權概念取代 Althusser 的意識型態成為媒體與文化研究理論的主導，同時他的共識（consensus）觀點能夠用以說明文化霸權鬥爭場域的反抗與妥協。

事實上，Williams 很早就提出類似於 Gramsci 關於霸權的論點，他在前述的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中指出，電視體系與統治權力之間的關係，正如其他大眾傳播媒體一樣，技術的發明與使用都是社會團體利益之間的折衝與妥協的複雜歷史過

程（1974:21），所以，Williams（1974:23）認為，媒體必然受到統治階級強烈影響，成為社會控制的一環，因為媒體符合既有統治階級的利益。

在接合媒體、意識型態概念、文化霸權和共識的觀點方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 Hall（1982）的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Hall 引用並綜合 F. de Saussure、C. Levi-Strauss、R. Barthes、J. Lacan、L. Althusser，和 A. Gramsci 等人的概念，主要目的在於批判美國媒體的實證行為研究，忽略歷史脈絡、社會，與政治權力，以及社會結構與經濟等議題，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建立學術霸權之後，貶低社會偏差者，在媒體論述上將其置於主流價值之外的邊緣地位。同時，Hall 質疑美國媒體研究中關於媒體反映（reflect）真實的說法，對 Hall 來說，媒體在定義與建構真實時，基本上是一種再現而非反映。所以，對於媒體訊息的分析，不需要再以表面內容為對象，而應詮釋其意識型態的建構過程。這就是意識型態的建構過程被美國媒體研究壓抑（repress），而必須由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予以重返（return）。

綜合 Hall 的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與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兩篇文章可以發現，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逐漸從結構主義轉向文化主義，同時文化霸權與共識的概念成為主導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但是在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正式邁向閱聽眾分析之前，許多關於次文化的研究領域紛紛興起，這些次文化研究是以媒體實踐為主要操作場域。

最早出現的次文化研究文獻，是 Hall 在 1968 年的 *The Hippies*，主要探討美國 1960 年代的嬉皮運動，其後 D. Hebdige 從 1971 年開始即對英國青少年次文化進行一連串的研究，而 J. Clarke and T.



Jefferson (1974) 在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中探索次文化與工人階級青少年次文化的政治性等議題，另外，Clarke 在 1975 年 *The Three Rs: Repression, Rescue and Rehabilitation* 中，對工人階級青少年成長過程中，關於主流意識型態控制的探討。其中，較為重要的是 Hall and Jefferson 在 1976 年出版的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一書。Hall and Jefferson 肯定次文化的動力，認為文化其實是由更多的社會群體組成的，次文化能夠在物質生活實踐中定義自我獨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因此不是屬於單一脈絡，而是由這許多相互競爭且矛盾的社會群體組合的產物。

Hall and Jefferson 在這本書中明確指出：英國文化研究的本質其實是比較傾向社會學的研究，次文化研究就是要瞭解所有社會關係結構與外貌的最佳起點，他們特別關注這些次文化社會群體如何經驗與詮釋社會關係的結構與外貌。然而，在次文化的研究中，是將原先屬於社會意義的次文化轉成文本，成為文本分析的變型，對於次文化社會群體的實踐活動不是予以忽略就是成為偶發的詮釋。最主要的原因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尚未發展出合適的研究方法，無法從次文化社會群體的實際經驗中獲得有效的資料，這也就是 P. Willis (1980) 開始為英國文化研究尋找合適研究方法的動機，這個方法源自人類學的民族誌，同時亦引起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方法論建構的討論風潮，例如，R. Hollands (1985) 在 *Working for the Best Ethnography*，探索民族誌的歷史與學術起源，以及這個方法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妥善地被使用，影響層面相當廣泛，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關於方法論的重要論著。

另一與 Hall 和 Jefferson 的次文化研究相似的是，D. Hebdige 在 1979 年出版的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此書可說是 Hebdige 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合集，但是，它亦陷於將次文化的意義詮釋轉換成變型的文本分析之窘境，這可從 Hebdige 的理論進

路窺知端倪。Hebdige 是以 R. Barthes 的符號學分析著手，主張次文化理論必須自符號的意義開始，再將其放置到社會與歷史的脈絡中解讀。對 Hebdige 來說，任意拼湊（bricolage）這個借用自 C. Levi-Strauss 的概念，能夠解釋工人階級青少年次文化風格，是透過特殊的消費實踐，不但暴露其秘密特性，又傳遞某些禁忌意義。<sup>9</sup> 根據 Hebdige 的說法，青少年次文化這種任意的拼湊，是一種顛覆性的實踐過程。

Hebdige 又引用 C. Levi-Strauss 的類似（homology）概念，來解釋青少年次文化風格如何在混亂的層次上，組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他特別使用類似概念說明龐克（Punks）的風格。<sup>10</sup> Hebdige 同時藉此論證青少年次文化與媒體的關係，最初，媒體將青少年次文化視為偏差（deviance），許多報導都是負面的，然而在不斷地與主流文化的抗爭與妥協中，媒體挪用了青少年次文化的音樂和時尚風格，且吸納使其為主流文化的一部份。所以，在論及青少年次文化與流行音樂的關係時，Hebdige（1979:60）認為，當時的英國流行歌手 Bowi 所製造的服裝效果與音樂風格，為工人階級青少年在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的向上流動過程中，提供了最佳的參考架構。

媒體與流行音樂，因而被次文化研究視為是工人階級青少年與主流文化抗爭與妥協的主要場域。一方面，這樣的思考脈絡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開展新的研究議題，另一方面，這亦說明流行音樂與青少年次文化研究是同時並進、相互糾葛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最重要的流行音樂文獻是 Willis 在 1974 年的 *Symbolism and Practice: The Social Meaning of Pop Music*，對於嬉皮（Hippies）和飛車黨（Motor-Bike Boys）青少年次文化的象徵形式與風格多所描繪，尤其著重在他們的流行音樂特色，是一種對主流文化的反抗論述。流行音樂因此在英國文化研究中，被視為是與前衛藝術（the advent

garde)於歷史脈絡中永無靜止的關係,特別是 Iain Chambers (1986)將前衛藝術當作是都市生活中新政治的動力來源,是一種激進的運動主張,也是反抗資本社會理性化的生產方式和官僚制度下的文化策略。

次文化研究持續擴展研究範圍的結果,是種族論述在 1980 年代介入英國文化研究,與次文化研究相當不同的是種族論述並非發自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內部,而是經過學術論辯之後被文化研究接受,同時種族論述的主要操作場域是逐步地邁向媒體文本。關於種族論述會受到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重視,基本上有兩個原因。一是歷史性因素使然,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因勞動人口缺乏,自過去殖民地移入大量黑人移民,引發黑白種族之間的矛盾與糾紛,種族問題逐漸被搬上檯面<sup>11</sup>。

此外,英國境內原本就有的種族問題其實也相當嚴重,同屬塞爾特(Celtic)後裔的蘇格蘭人(Scottish)、威爾斯人(Welsh)和愛爾蘭人(Irish),在暗地裏仍然不服英格蘭人(English)的統治。<sup>12</sup> 比起蘇格蘭人來說,威爾斯人的民族認同並沒有因為保留語言而有更好的處境。<sup>13</sup> 愛爾蘭人,特別是居住在北愛爾蘭(舊稱額斯特 Ulster)六個郡的愛爾蘭人,從 1970 年代以來,藉由實際的抗議行動尋求獨立,雖然宗教和種族因素是導致這個地區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sup>14</sup> 關於英國的華裔移民,比起上述這些種族來說,幾乎處於完全「沒有聲音」的位置,到目前為止,英國關於華裔移民的研究相當缺乏,至今仍只有極少數的研究主題與華裔有關。<sup>15</sup>

二是種族論述(racial discourse)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滲透。這個 Hall 與 P. Gilroy 所引發的種族論述與文化研究論辯,對於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影響極深,種族研究者將媒體視為種族再現與表意的系統,批判媒體關於種族的意識型態。<sup>16</sup> 種族論述介入英國文化研究起因於 Gilroy 對文化研究排除種族議題,獨尊英格蘭性

(Englishness) 的論爭。他認為，文化研究有意識地在外表上作為一個反國家者 (anti-states)，但在暗地裏仍是一個國族主義者 (nationalist)。因為 Gilroy 的批判與啟發，使得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開始處理種族議題，1979 年問世的 *Policing the Crisis*，是首部專門討論這方面的專書，論述重心在於 1972 年時發生於倫敦 (London) 的攔路搶劫 (mugging)，產生黑白種族在道德恐慌背後的危機，這是處理種族議題中最为徹底且兼具廣度與深度的著作，同時亦將觸角伸向媒體文本，探索其如何報導種族議題。而由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1982 年出版的 *The Empire Strikes Back*，是將種族議題真正深入文化研究之中，且釐定研究計劃的重要論著。

Gilroy (1987) 在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一書中，對於英國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的建構有許多精闢的批判，他認為是國族主義使得文化研究中的種族議題無法出現，而 R. Williams 竟然類似保守主義者一般，對於移民議題的理解，是將種族關係 (ethnicity) 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與公民權 (citizenship) 劃上等號，最終使種族差異的象徵屈服在真正的屈服在英國性 (Britishness) 之下 (1987:49)。P. Gilroy 為持續他的論點，在 1993 年出版的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仍然質疑國際間對文化研究的狂熱是如何與英格蘭的深沉聯結 (1993:5)，他主張應該放棄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國族主義 (cultural nationalism)，而以文化社群 (cultural community) 來取代國族 (nation)、國家 (state) 或種族關係 (ethnicity) 等，作為種族議題的核心。

Gilroy 的影響力確實相當地大，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開始出現許多關於種族、流行文本與媒體研究的作品。例如，H. Carby (1979) 的 *Multicultural Fictions* 探索流行文本中多元種族文化，A. Green (1979) 的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lack Labour*

*and the Racial Structur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對英格蘭黑人勞工與工人階級的種族建構，以及 E. Lawrence (1981) 的 *Common Sense Rac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Race Relations* 透過社會學的方法討論種族關係等。

除了前述 *Policing the Crisis* 之外，關於種族論述與媒體研究相當重要的文章，還有 P. Braham (1982) 的 *How the Media Report Race* 一文，雖然並非出身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但是 Braham 的研究取向顯然與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頗為契合。P. Braham 論辯新聞媒體對黑人種族問題的處理方式是負面的，強調黑白種族的矛盾與衝突，新聞版面總是突顯黑人種族的偏差行為，而社論版面則著重英國移民的法案與政策，卻極少解釋黑人種族被建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因素，這些實踐過程其實是透過新聞價值與新聞架構 (framework) 對黑人種族問題處理不當所造成的。

著名的英國種族與國族認同研究者 B. Anderson，同樣並非出身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但是他在 1983 年的 *Imagined Communities* 一書中，所處理的關於國族主義歷史根源的主題，卻對英國的媒體與文化研究有相當深遠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 P. Gilroy 不同的是，Anderson 直接影響英國媒體研究的另一個層面，雖然這個領域最初並非文化研究關切的範圍，但是它所探討的議題稍後亦影響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發展。這種源自於 Anderson 的種族主義與國族認同觀點，被擴展延伸至日常媒體消費的論證，特別是以前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期刊為主要的研究者所作的貢獻。<sup>17</sup>

Anderson 指出，國族 (nation) 事實上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社群，因為即使是最小的國族，絕大多數的成員彼此也是毫無所悉，然而，在每個人心中存在著彼此共處一個國族社群的想像。根據 Anderson 的觀點，媒體成為國族認同的主要傳佈者，無論何種歸屬感，人們日復一日，從全國性的新聞廣播中學習到這種感覺，媒體

因此是造成強烈國族認同的潛在來源，許多湊熱鬧式的體育活動和政治慶典舉行時，媒體就充作大眾儀式的舞台。J. Hartley ( 1987 ) 可以說是引用 Anderson 論點的媒體先驅，他在 *Television Audiences, Paedocracy and Pleasure* 一文中指出：電視是主要為它的成員建構國族的地方，國族作為想像社群，是一種特別論述的建構過程 ( 1987:5 ) 。

這個媒體研究取向立即擴展開來，D. Cardiff and P. Scannell ( 1987 ) 在 *Broadcasting and National Unity* 一文有詳盡的論述。他們認為英國 BBC 透過它的歷史，製作出一些節目，讓無論是在地區、全國或帝國境內的閱聽眾提升國族認同的感覺 ( 1987:157 ) 。Cardiff and Scannell 強調，如果尋找 BBC 早期的廣播節目表 ( schedules ) ，就會發現每天或每週的個別節目，會在每年一連串的公共事件，慶典或國家儀式中循環，所有的節目都呈現於單一旦統一的脈絡裏 ( 1987:159 ) 。所以，BBC 建構它自己作為國族文化代理者的角色，使得節慶、儀式和典禮，在每年的年曆中，以相當規則和有秩序的形式被標出 ( 1987:160 ) 。

Cardiff and Scannell 指出，國族認同透過無線電收音機以及全國閱聽眾的參與，進入一個新的關係，很自然的情況是，廣播出現以後，將個人聯結到國族生活的中心，同時擴及每個地區 ( 1987:160 ) 。英國的廣播從業人員想要讓他們的閱聽眾，認知到廣播有某種獨特的潛能，就是聯合 ( unite ) 公共和私人生活領域，因為這個理由，使得有關國族認同的節目，形成英國廣播的主幹 ( 1987:161 ) 。Cardiff and Scannell 認為，最普遍的國族認同象徵就是家庭，隱含著英國母親和她在帝國當中的孩子們，也是皇家和每個閱聽眾所組成的小家庭 ( 1987:163 ) 。

對 Cardiff and Scannell 來說，不僅廣播展現國族認同的潛力，而且電視更因為視覺的輔助以致達到極強效果，他們指出，電視能夠

描繪慶典的狀觀畫面，那是廣播沒有能力作到的，電視就像廣播一樣，可以把國家事件綁在一起（bind together），例如，英國皇室登基（coronation）的盛況，無論是神聖的（sacred）或世俗的（profane），都藉由媒體而運作（1987:167）。Cardiff and Scannell 強調，如同 Brunson and Morley（1978）在 *The Nationwide* 研究中指出的，*The Nationwide* 這個公共事務節目把閱聽眾論述成家庭國族（a nation of families），並且說國族作為一個家庭（the nation as a family），是由不同區域組成而非階級的（1987:171），而 Morley 在後來（1980）的研究中則是指出，大量的閱聽眾準備好接受由 *The Nationwide* 這個節目所提供的自我形象，這樣國族的象徵、公共事務報導，與家庭娛樂休閒就聯結在一起（1987:171）。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另一個相當重要的擴展，是女性議題（women studies）也在 1980 年代介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起因於女性學者對文化研究缺乏性別議題感到不滿，直接造成 *Women Take Issue* 論著於 1978 年誕生，其與前述的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一樣，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性議題釐定研究計劃。事實上，在本書出版前，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已有零星的女性議題研究，同時皆以媒體與電影為主要的操作場域，例如，H. Butcher, et al.（1974）的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edia*，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詮釋女性在不同傳播媒體的再現形象，包括新聞報導、性慾對象、卡通幽默、自我再現、廣告與通俗小說文本等，是相當重要的女性、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論著。

事實上，女性議題亦是次文化研究中的領域，許多關於女性、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論著，與青少年次文化社會群體接合。A. McRobbie 曾批判 Hebdige 對青少年次文化的考量，存在著對女性結構性位置的有意忽略，性別權力關係問題似乎無法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論上獲得解決，造成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進行次文化解讀

時，出現許多問題，例如，不同性別的主體在解讀流行媒體文本時帶來的愉悅。 McRobbie 因此開始進行關於女性青少年次文化研究，例如， McRobbie ( 1978 ) 的 *Jackie: 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她使用英國暢銷的女性青少年雜誌 *Jackie* 為分析對象，探索女性陰柔特質 ( femininity ) 建構過程中隱含的意識型態。而 C. Griffin ( 1982 ) 的 *Cultures of Femininity* 是將女性陰柔特質的建構放置於羅曼史 ( romance ) 等通俗小說的論述脈絡中。另外， J. Winship ( 1980 ) 的 *Advertising in Women's Magazines* 討論女性雜誌中的廣告文本，後來， Winship ( 1981 ) 繼續擴展其論點，在 *Woman Becomes an Individual* 一文中，以歷史分析角度，探索女性雜誌中的陰柔特質與消費建構。

從這些早期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女性議題、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發展，基本上是以文本分析為主要方法，流行媒體與通俗文本則是相當重要的操作對象與場域。然而，關於女性或性別 ( gender ) 主體建構的過程，仍然處於前述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矛盾之間，這必須等到閱聽眾分析領域的興起，才逐漸地由結構主義轉向文化主義的立場。嚴格說來，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 1980 年代興起的閱聽眾分析。一方面，這個閱聽眾領域與美國實證主義的閱聽眾分析不同，特別重視閱聽眾的主體性與媒體實踐；另一方面，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次文化議題，例如，階級、種族、青少年，與性別等，紛紛介入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取向，使得閱聽眾分析的發展帶有相當強烈的批判色彩。如同前述， Hall 的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這篇文章的主要貢獻在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的閱聽眾分析之學術取向，奠定理論基礎，特別是 Hall 提出的製碼與解碼模式的創新觀點，結合文學的接收分析 ( reception analysis ) 方法，徹底地被應用至媒體與文化研究。



Morley 可以說是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關於閱聽眾分析領域的重要人物。Morley 早在將 Hall 的製碼與解碼模型落實於經驗研究之前，就於 1974 年發表 *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 一文，討論閱聽眾分析與主體建構的重要性。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閱聽眾經驗研究，最重要的論文就是關於 *The Nationwide* 這個英國 BBC 於傍晚播出的公共事務節目的論著。這個研究是由英國 British Film Institute 資助，並且將其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 Brunson and Morley (1978) 所作的文本分析，接著 Morley (1980) 則檢視不同社會階級與種族背景的閱聽眾如何解讀 *The Nationwide* 這個節目，Morley 應用 Hall 建構的譯碼與解碼模式，來探索電視閱聽眾的解讀策略。雖然，這個研究隨後遭到許多批評，特別在它的方法論上，例如，Morley 採取團體討論 (group discussions) 的研究設計，但卻導致忽略家庭脈絡的結果，更嚴重的是，他沒有解釋這類型的電視節目和閱聽眾之間的關係。

Morley 這個研究的突破，在於挑戰美國實證研究中有關閱聽眾的概念，同時為媒體與文化研究開展新的領域，Morley 的研究有三個價值：一是將媒體與文化研究帶向經驗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而非僅是紙上談兵的理論辯論；二是導引出電視閱聽眾研究的質化取向 (qualitative approach)；最後是相當重要的貢獻，係將焦點放置在社會學式的 (sociological) 而非心理學式 (psychological) 的閱聽眾，這涉及到閱聽眾主體性建構的問題。A. Kuhn (1984) 曾經區分這兩種類型閱聽眾的差異，根據她的看法，心理學式的閱聽眾，也就是觀眾 (spectatorship)，是在 (in) 或透過 (through) 文本建構的，廣泛地被使用於文學和電影理論之中；然而，社會閱聽眾 (social audience) 則是一個經驗性的社會主體，是透過電視收看、到電影院看電影，或讀小說和雜誌等實踐方式建構的。

Morley 的閱聽眾主體與階級和種族等次文化社會群體有關，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更將觸角伸至性別次文化社會群體。這個以性別為主的研究取向與議題，事實上和女性主義（feminism）的主體理論介入電影與文學文本分析有密切關係。

A. Gray（1987:44）指出，性別化的閱聽眾（gendered audience）有其理論歷史，如同前述 Kuhn 的主張，一是源自於媒體與文化研究領域，另一是來自於電影理論，形成兩種相當不同的性別化閱聽眾概念。根據 Kuhn 在媒體與文化研究中所強調的社會閱聽眾，原本就區分男性與女性的流行文本與媒體類型，同時亦探討男性與女性如何解讀這些文本；但是文學和電影理論注意的是心理閱聽眾，是由文本來解讀他們，主體是透過文本建構的。

Gray（1987:45）繼續批判指出，文學和電影理論中強調的觀眾與文本（spectator-text）關係，忽略觀賞電影和收看電視時的社會脈絡，他們因此很難發現主體是透過社會環境建構的；相對地，社會閱聽眾取向將文本的反應看作是社會性地先前決定的（socially predetermined），所以，不會讓文本來決定閱聽眾。

*Screen* 期刊在 1970 年代引進 J. Lacan 的理論立場，進行電影與文學的文本與主體建構的研究，就是心理閱聽眾取向的濫觴。以 *Screen* 期刊為發言空間的研究者，認為閱聽眾過去的論述形構與社會關係，對於其主體的建構並無關聯，同時主體在任何時刻，總是與單一文本發生關聯，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自然就被忽略，這個以電影論述主體建構過程的觀點被稱為銀幕理論 screen theory（D. Morley, 1992）。事實上，這種主體建構的理論觀點，很早就遭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質疑，Hall 就針對 Lacan 的精神分析提出批判，Hall 認為，S. Freud 和 Lacan 論述中所稱的伊底帕斯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機制，沒有歷史感，是一種本質論（essentialism）的基調（D. Morley, 1992）。

所以，這種文本取向（text-oriented）的主體建構時常落入危機的陷阱，成為化約主義者。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的初期發展，主要探索媒體文本與不同社會群體解讀之間的關係，如同前述，這是源自文學的接收分析方法，因而採取以社會閱聽眾為主要的研究取向，在 Brunsdon and Morley（1978）進行研究計劃的同時，他們以階級為中心的（class-centered）和種族（racial）閱聽眾分析，由於女性議題介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使得性別的（gendered）閱聽眾取向，亦成為主要的操作場域。著名的女性與媒體研究者 D. Hobson 在 1978 年的 *Housewives: Isolation as Oppression* 和 1980 年的 *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探討女性與收音機和電視的使用關係。Hobson 在 1982 年完成的 *Crossroads*，主要目的在於探索伯明罕的主婦們如何解讀肥皂劇 *Crossroads*，同時如何獲得收看愉悅（pleasure）。根據 Hobson 的看法，媒體文本與女性閱聽眾的關係不應由文本單獨決定，還要從其他論述，例如，母職（motherhood）或羅曼史（romance）等來加以解釋。<sup>18</sup>

雖然並非出身當代文化研究中心，I. Ang 的研究成果仍舊受到女性議題與媒體研究者的重視。首先，她當時於荷蘭從事研究工作，在地緣上與英國相當接近；接著，正因這個地理位置的接近性，許多荷蘭或丹麥的大學都設有媒體研究科系，學術往來相當密切；最後，Ang 的女性與媒體研究取向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相當類似。<sup>19</sup> Ang 在 1985 年出版的 *Watching Dallas*，對於女性閱聽眾如何解讀女性媒體文本的研究具有長遠的貢獻，Ang 發現荷蘭女性透過解讀美國流行電視肥皂劇 *Dallas*，獲得愉悅，特別是肥皂劇中對家庭私人領域的描繪，使得原本枯燥無味的生活，因為肥皂劇中的生老病死、結婚、離婚、戀愛和外遇等情節，讓女性具有生活意義，建構女性主體與女性媒體文本之間的關係，形塑女性特有的文化空間。

關於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媒體文本解讀，特別在女性議題方面，

亦擴展至流行通俗小說。雖然並非出身於當代文化研究中心，J. Radway 的研究似乎與這個學術取向頗為契合。Radway (1984) 的 *Reading the Romance*，以 N. Chodorow 的性別發展理論 (theories of gendered development) 為著眼點，解釋女性讀者閱讀羅曼史的動機，她發現女性讀者藉此獲得情感的滿足，而羅曼史的敘事結構使女性進到個人的想像世界之中。接受 Radway 訪談的女性讀者指出，她們閱讀羅曼史的原因，是因為再也找不到任何片刻的隱私，來躲避家庭與職業生活永無休止的要求，閱讀羅曼史本身就是代表她與瑣碎例行的家務之間劃上一道鴻溝，對 Radway 來說，閱讀羅曼史正是女性一種最微弱的抗議，是對於女性身陷父權制度不滿的表現。

然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閱聽眾分析，不僅在次文化社會群體的主體建構認識論上經過論辯得到發展，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長足的進步。事實上，I. Ang 採用的方法引起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質疑，因為她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募願意參與研究的女性閱聽眾，最後卻使用這些自願者的回信作為分析文本，如同 Gray (1992:22) 所批判的，Ang 在 *Dallas* 的研究素材，讓女性從社會脈絡中抽離出來而 Radway 的抽樣範圍有限，同時沒有比較女性受訪者之間的差異。有趣的是，Morley 採用的團體討論方法，雖然塑造類似社會情境的討論空間，但是畢竟它像極實驗法中的實驗室設計。嚴格說來，這些都不是閱聽眾研究，因為所有可能的社會情境完全被忽略，真正採用民族誌的是 D. Hobson (1982) 的 *Crossroads* 以及 A. Gray (1987) 的 *Behind Closed Doors* 研究。<sup>20</sup>

這種民族誌方法不但在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的女性議題受到重視，它亦進一步地被運用至傳播科技與消費論述的家庭脈絡中。Gray (1992:21) 曾經批判指出，由於太過注重特定的閱聽眾，例如，階級、種族與性別等次文化社會群體，反而忽視家庭閱聽眾。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有關文本與閱聽眾取向已經被自己限制住，

在 1980 年代中期受到挑戰，一方面，將其研究關切的重心從文本轉移到傳播科技；另一方面，也將研究的對象從個別閱聽眾轉移到家庭閱聽眾。如同 Morley（1986）早已指出，電視的使用和收看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尤有甚者，電視閱聽眾不僅是收看電視而已，他們也使用電視，所以，電視科技成為閱聽眾研究的中心議題，電視科技本身可以被看作一種文本由閱聽解讀，這與電視或傳播科技的使用有關（R. Silverstone, 1990:178）。

植基於這種論點，Gray 是首位探索傳播科技與女性閱聽眾的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者。Gray（1987）在 *Behind Closed Doors* 一文中，關切住在英國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女性閱聽眾，如何收看與使用錄影機（VCRs）和電視機等傳播科技。這個研究的價值在於轉移其重心至探索傳播科技和女性閱聽眾之間的關係，因為圍繞在電視機和傳播科技旁的收視文化不僅與媒體文本有關，同時也與電視或傳播科技的使用有關。在 Gray 的研究中，將女性收看者放置於家庭脈絡裏，特別是傳播科技使用與她們家事所花的時間以及個人的空閒時間等關係。然而，Gray 關心的是女性閱聽眾而非家庭閱聽眾，這裏浮現的議題是：家庭成員間在使用與消費傳播科技時的性別與世代權力關係。如同 Moores（1995:94）批判 Gray 的研究指出，性別並非主要決定家庭科技設備的使用和專精程度的因素，所以，傳播科技與家庭生活的關係或許才是研究者必須關切的重點，這要考慮的是家庭閱聽眾並非只是女性閱聽眾而已。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的轉折，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首先，過去關切次文化社會群體的閱聽眾主體建構，係朝家庭閱聽眾的消費實踐著手；接著，以媒體文本與閱聽眾解讀的接收分析，轉往媒體科技的消費與使用；最後，民族誌方法得到充份應用。Morley 正是進行家庭閱聽眾研究的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先驅，他在 1986 年出版 *Family Television* 一書，將文本與閱聽眾的研究興趣，

轉而探討電視科技與家庭生活，他採用民族誌方法，參與觀察，並深入訪談，以瞭解閱聽眾在家庭脈絡中的電視使用與收看的社會實踐。

Morley ( 1986:34 ) 指出，閱聽眾研究的最大進展之一，就是逐漸認知到收看脈絡的重要性，以電視研究來說，就是指再次認知到家庭脈絡的重要。與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研究相同的是，Morley 還是將其焦點放在社會階級與種族的差異，然而他卻發現了電視收看和使用，在性別方面的顯著意義 ( Gray, 1992 )，例如，男性閱聽眾喜歡陽剛類型 ( masculine ) 和事實性的電視節目，但女性則喜歡陰柔類型 ( feminine ) 和虛構性的節目。此外，亦發現家庭性別權力關係在電視使用與收看的實踐，例如，男性與女性為爭看喜歡的頻道與節目，搶奪電視遙控器的主控權。

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閱聽眾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遭遇口述歷史訪談 (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 的挑戰，閱聽眾分析因而自當代的情境加入歷史的書寫 ( historical writing )。這個取向不僅關切傳播科技的消費使用與家庭生活的關係，而且相當注意特殊的歷史背景和脈絡。如同 Silverstone ( 1994:24 ) 辯稱，廣播電視媒體的研究，「在理想與實際的家庭生活中，不只是一種社會學形式，也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的現象。」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的歷史取向，由受訪者的記憶 ( memory ) 來書寫廣播電視科技與家庭生活的歷史，最典型的例證是 Moores ( 1988 ) 的 *The Box on the Dresser*，採用口述歷史訪談的方法，探索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間，廣播科技與每天生活的關係，他訪談在英格蘭西北部小鎮 Warrington 的老年受訪者，獲得他們早期在家戶 ( household ) 中的起居室收聽廣播的個人記憶。Moores 並設法與地方權威機構接觸，例如，老人日間中心，尋求社區領袖協助以接近受訪者，Moores ( 1995:76 ) 論及此項研究時指出：「我的目的是…透過這

些記憶的分析，從聽眾的觀點將早期廣播的文化歷史拼湊起來。」

Moore's 的主要發現是，廣播科技經閱聽眾的被家庭化（*domesticated*）實踐，得以進入家戶空間（*household space*）成為家庭休閒娛樂的重要文化形式，Moore's 研究的價值，在於使記憶成為歷史取向的家庭閱聽眾研究之中心要點。而關於電視科技與家庭生活的典型研究例證是 T. O'Sullivan 在 1991 年的 *Television Memories and Cultures of Viewing, 1950-65* 論文，他亦採用口述歷史訪談方法，訪問 21 對居住在英格蘭的 Kent、North Yorkshire，和 South Walse，超過 55 歲的老年夫婦，以此獲得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間記憶中的電視經驗。O'Sullivan 在訪談每對夫婦時都是一起訪問的，他亦發現電視成為英國家庭的主要娛樂形式，不但佔據家戶空間，同時也影響家庭時間的使用與生活作息，更重要的是電視科技改變家庭性別與世代的權力關係。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的發展，是使更多的歷史視野放到閱聽眾主動性（*audience activity*）來瞭解，同時這也關係到社會和政治的結構與過程，雖然它可能是個獨立的現象和研究客體，但閱聽眾的主動性具體表現，仍舊是持續進行的文化實踐和關係的網絡（Ang, 1989:101）。事實上，無論是當代或歷史取向的家庭閱聽眾研究，家庭脈絡的媒體與傳播科技的使用與實踐，必須要放在男女兩性主體的每日建構（*everyday construction*）中，在這一點上，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讓我們看到在批判的研究方法裏，媒體與閱聽眾的關係不僅是文本和收看者之間的妥協，電視消費的過程、以及電視的文化位置，都產生新的可能來建構社會關係，認同和慾望（Ang, 1989:109）。更進一步說，在家庭脈絡中的媒體與傳播科技使用與消費的實踐，不應只有探索男女兩性在媒體消費型式上的關係，也應討論世代、朋友、同儕之間的關係，同時更要瞭解公共與私人領域的關係（Ang, 1995:218）。

## 肆、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發展

1990 年代以後，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方向，主要受到法國文化社會學者 P. Bourdieu 消費論述的影響，特別在媒體與傳播科技和家庭消費與使用的權力關係議題。雖然，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早在 1977 年就有 R. Nice 引介 Bourdieu 的理論觀點，但必須等到 1980 年代中期之後，Bourdieu 的重要性才與日俱增。主要關鍵在於，消費本身被認為是一種文化實踐過程，商品消費賦予人某種程度的文化意義；同時，消費的觀點將過去侷限於結構主義的分析範疇擴展到後結構主義，適合後現代社會對消費過程的分析。

Bourdieu 的最大貢獻，就是以社會學中關於社會身份團體的概念為基礎，結合休閒社會學（leisure sociology）既有的消費研究取向，以及象徵、符號和流行文化的分析取向。以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發展來說，Bourdieu 的研究取向兼具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因為他所強調的是人們在取得經濟或文化資本上所站的結構位置，不過，他並非結構主義者，Bourdieu 認為，在人們的主觀意識之外，存在著階級、種族，和性別等結構，影響人們文化能力的獲得以及品味的形成。

在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閱聽眾分析中，Bourdieu 為文本、科技、意義與主體建構的實踐過程，提供新的理論方向。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過去批判的閱聽眾研究，認為主體是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所決定的，如今無法單從語言或符號的運作層次，瞭解各種不同社會群體藉由流行文化與媒體文本產生的文化意義，而必須結合經濟與文化資本兩者的討論，才能論述主體建構的過程。在特定的閱聽眾解讀或使用媒體文本與媒體科技時，閱聽眾的社會經濟結構位置並不一定建構其主體性，而是社會經濟結構位置可能會產生其



他的建構與限制效果，也就是不同社會群體的閱聽眾，擁有多少文化能力與品味的問題。

Bourdieu 的論點，大量地被應用至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中的流行文化與媒體文本與科技類型的消費論述。最初 Bourdieu 的論點經常被用於關注高級藝術，例如，領會或接受藝廊和歌劇院等內容。然而 Bourdieu 這種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尋找解讀高級藝術社會群體的企圖，原本與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計劃並不相符，最終是被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者，特別是女性、媒體與文化研究者，延伸至不同類型的流行文化與媒體消費論述，使 Bourdieu 的論點從高級藝術導向通俗藝術。

C. Brunson (1981) 早在 *Crossroads: Notes on a Soap Opera* 一文中聲稱，收看電視肥皂劇的女性觀眾必須具備某種特殊形式的文化資本，也就是對於家庭內的人際關係之符碼，保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能力，否則無法欣賞電視肥皂劇。促成 Bourdieu 理論觀點的影響力開始浮現的另一原因，是他在 1972 年關於 *The Berber House* 的研究，對於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啟發。Bourdieu 的主要目的，是闡述性別關係之內，公共和私人領域如何與家庭科技產生接合 (articulation)。Bourdieu 的這些論點，在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成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主要取向。

近來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論述脈絡中，不但關切社會存在的許多領域，如何整編傳播科技，特別是不同的性別或階級領域如何整編它們，而且也注意到在建構及重構這些領域之際，傳播科技的角色是什麼。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者將 Bourdieu 的論點，接合至廣播電視科技、家戶空間與家庭時間，以及性別與階級關係的討論，同時將其放置於家庭脈絡之中。如同 Moores (1988:26) 論稱：「工人階級家庭的內在空間是提供特定活動的場所，在這些空間內也產製家庭性 (domesticity) 的意識型態，以及建立家庭成員的認同。」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者主張，物理空間（ physical space ）並不同於文化空間（ cultural place ）。物理空間指涉的是家戶的物理性使用，安排和配置的情況；但文化空間所關切的是人們如何使用這些物理空間進而產生文化意義（ T. O'Sullivan, 1991:167 ）。如同 Morley （ 1992:215 ）辯稱：「居家的物質本質，伴隨著在房子裏空間配置的文化規則可以用來瞭解電視是如何，由誰或基於什麼目而被使用的。」所以，家戶的空間安排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中可以看作是一種物質現象。

最典型的例子是 Leal （ 1990 ）比較巴西的上層階級（ upper-class ）和工人階級（ working-class ）家庭，電視機放置與家戶空間安排差異的研究。Leal 立論的基點是，電視機與電視節目都是被消費的客體，它們被消費的方式與家戶的特殊文化形式息息相關。Leal 藉由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和品味的論點，呈現巴西上層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如何放置電視機。對 Leal 來說，電視機與家戶空間的配置與選擇，並非原本如此，而是人們的行動讓它變得有意義，也就是說，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都是演員，將物質客體（ material objects ）轉變成文化客體（ cultural objects ）（ O.F. Leal, 1990:21 ）。在 Leal 的實際訪談中，他發現巴西人們在放置電視機這個客體時，是根據兩個觀點：一是美學，另一是實用（ O.F. Leal, 1990:21 ）。人們不可能用金錢來裝潢自己的家戶，卻是將物質客體的商品美學本質轉換成具有社會意義，也就是馬克思（ K. Marx ）指稱的商品拜物主義（ commodity fetishism ）概念的精髓。

Leal 在研究中，巧妙地將馬克思商品拜物主義概念與 Bourdieu 的品味與文化資本等概念聯結起來，用以比較巴西上層與工人階級家庭的差異。他發現，工人階級家庭很少有照片，因為照片對他們來說是相當昂貴的東西，同時家庭中能展示的空間不足，但是他們卻願意在電視旁擺著全家福，顯示工人階級家庭對擁有電視感到驕

傲，因為電視為家庭世界帶來知識與現代的感覺。所以，工人階級在佈置客廳時，總是留下每個明顯的位置，來擺放具有現代性的物質客體，這當然包括電視在內（O.F. Leal, 1990:23-24）。

然而，Leal 的研究清楚地發現，工人階級的品味對上層階級來說是低級且沒有格調的，因為上層階級在每天生活中有許多選擇和可能性，同時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來接近商品。以家戶空間的配置而言，上層階級家戶房間區隔得很好，注重隱私、自我與個人性。上層階級家庭的電視擺設，並沒有像工人階級那樣喜歡在電視旁放置小飾品，基本上，他們認為電視是缺少美學價值的，它的所有形式與外型都是實用的，不會有任何裝飾（O.F. Leal, 1990:25-26）。

Leal 從不同階級的文化品味，探索廣電科技與家戶空間的關係，顯然對於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研究發現，大部份的人將電視放在客廳，同時電視也會改變家戶空間的配置（T. O'Sullivan, 1991:167）。然而，這個論點還可以再往前擴展的是，廣電科技不僅在家戶的內在與外在空間之間穿梭流動，同時也改變人們的私人與公共經驗。<sup>21</sup>Moore (1988) 在研究收音機這個傳播科技如何進到英國家戶空間時發現，客廳原是家人團聚的空間，卻因為收音機逐漸攻佔而改變其文化意義，也就是家人團聚的目的在於聆聽廣播節目，與原本客廳只是單純地作為家人團聚空間的意義有顯著的差異。此外，O'Sullivan (1991) 在他的研究中便發現，收看電視對英國人來說，原本是一種公共經驗，他們大多數是與親戚或朋友一同觀賞，但是逐漸地電視轉變為家人共同收視的私人經驗。這種改變最重要的是取代某些物理空間的文化意義，換言之，廣電科技使得家戶空間，成為私人或公共領域之間不斷辯證的過程，

與 1980 年代的發展相似的是，種族論述在 1990 年代仍然是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重要的操作場域，特別是與青少年次文化的接

合。最重要的研究例證是，M. Gillespie（1995）的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他探索英國倫敦來自印度旁遮普省（Punjabi）的青少年移民，如何使用與消費電視媒體。Gillespie 發現，這些具有印度裔種族背景的青少年在地方、全球、國族，與國際的脈絡和文化中掙扎。更進一步地，Gillespie 亦發現，這些青少年在父母親來自印度的文化傳統與當代價值之間，不斷地妥協與鬥爭。然而，Gillespie 最終發現，這些印度裔青少年透過電視使用與消費的實踐，挑戰父母親的文化傳統，建構自己的收視文化。

在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 1990 年代以後的發展中，性別議題仍然是相當重要的研究領域。過去以探索文本解讀與性別閱聽眾的愉悅，建構性別閱聽眾的主體性，特別是女性閱聽眾與女性媒體文本之間的關係，男性閱聽眾在這些研究中是消失的主體，如同 Morley（1989:37）辯稱：「...雖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女性的收看成為顯著的類別，也是最有必要分析的問題；相對地，另一個，不顯著的類別之收看型態（例如男性的陽剛文化），仍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而不需注意的。」（另請參閱 L. Van Zoonen, 1994:124）。這種以女性閱聽眾為主的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近來在廣電科技與家庭生活的領域中，已逐漸地轉移至討論性別閱聽眾如何收看與使用電視的議題。

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來說，關於性別閱聽眾分析，基本的論點是廣電科技使用與收看的性別關係焦點集中於家事的分工，家事分工涉及到家對於男性和女性的定義不同。如同前述，根據 Bourdieu（1992）的看法，對男性來說，家是休閒的場所，然而，對女性而言，則是工作的地方，因為家戶空間的配置與意義，是依照性別差異建構而成的。如同 O'Sullivan（1991:176）指出：「對男性來說，晚間典型的休閒空間指的就是，工作後的時間，一種完全、自由自在，且正式的空間，休閒的選擇包括在家裏或外出。然而，對女性

而言...收看電視一般來說只是從持續不斷的家事和以家務為主的責任中所得到的暫時的休息。」所以，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性別閱聽眾分析注重討論家事分工如何影響廣播電視的使用、收聽和收看。

家事因此直接影響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作息中時間的使用 Gray (1987:41) 在 *Behind Closed Doors* 一文中辯稱：「的確，許多女性一點都沒有考慮到她們自己是否有什麼休閒時間。她們總是要等到孩子已經餵飽且讓他們上床睡覺，同時家庭瑣事已經告一段落，否則許多女性根本不允許自己坐下來收看電視這類奢侈的活動。」 Gray 在結論時指出，對這些女性來說最佳的策略就是保持對家用錄影機的無知，免得錄影機的操作也成為她們家事的負擔。所以，家事分工一再地強化這種使用和收看廣電和傳播科技的性別關係。Gray (1992) 在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一書中持續強調相同的論點，將錄影機與電視機的使用與消費，以及女性閱聽眾在家庭脈絡中的歷史與結構位置接合，論述女性閱聽眾如何在家戶空間、家庭時間、家事，媒體與科技使用與消費取得妥協，建構女性主體的文化意義。J. Wajcman (1991:87) 因而指出：「在現有的證據中顯示，家庭科技強化丈夫與妻子之間傳統的性別分工，且更確定地將女性捆鎖在她們這種傳統的角色裏。」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取向，在 1990 年代最大進展就是將性別議題擴展至家庭成員權力關係，與媒體或傳播科技的使用與消費。如同 Van Zoonen (1994:114) 批評指出，在 Morley (1986) 關於 *Family Television* 研究裏的女性閱聽眾，似乎有種支配的地位，這和一般西方文化中性別的差異不甚相像。Zoonen (1994:114) 同時也辯稱，在 Gray (1987, 1992) 的研究中，好像每個女性受訪者都有彼此相同的特性，矛盾的是，Gray 是從不同社會階級裏選擇這些受訪者的。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閱聽眾分析相當注重廣播電視收聽或收

看的性別關係，卻輕忽世代關係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Morley（1986）在 *Family Television* 研究裏，雖然共同訪問雙親和孩子的電視經驗，且提出電視收看性別關係之顯著意義，然而卻掩蓋世代關係的議題。如同前述，家庭閱聽眾分析應包括階級、性別、種族，與世代關係。關於世代關係成為媒體與傳播科技的使用和消費的議題，D. Buckingham（1987）早在 *Public Secrets* 研究中，針對青少年閱聽眾如何解讀英國電視肥皂劇 *East Enders* 做過探討，而 Buckingham（1993）所編的 *Reading Audiences*，則是持續他的研究興趣，從媒體教育的觀點，檢視青少年如何使用流行媒體。事實上，Gray（1992）的論著中，發現英國母親因為心理健康的理由，對孩子觀看電視與使用錄放影機都有規定。

另外，O'Sullivan（1991）強調，電視使用和收看對英國家庭雙親和孩子的關係帶來緊張和焦慮，O'Sullivan 發現，電視收看使丈夫和妻子之間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間發生衝突，父母為孩子選擇電視節目且規範他們的收看型態，因此導致兩者之間的衝突（T. O'Sullivan, 1991:171）。O'Sullivan（1991）亦發現，電視在英國被認為是對孩子的學習有幫助的家庭設備。除收看型態的規範之外，孩子在家庭生活中的時間使用被電視所支配。電視科技與孩子在家庭生活的作息，不僅可以看作電視帶來的衝擊，同時也是父母和孩子一種妥協的關係。如同前述，電視使用和收看的規範已經導致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緊張和焦慮。相對地，電視也提供一個機會重組父母和孩子的關係，因為電視已經成為孩子每天生活的陪伴。這些論點不但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 1990 年代關於閱聽眾分析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同時諸多議題成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在 20 世紀末的主要取向。

## 伍、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建制

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環境在 20 世紀後期有相當大的變化。一方面，在閱聽眾分析取向上，已經從文本的接收分析朝往媒體或傳播科技與文化意義產製，這顯示閱聽眾的主體建構由文本意義的解讀轉向所有可能影響閱聽眾主體建構的現象學式的（phenomenological）物質因素。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建制，從 1980 年代以後，由於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開展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領域，使得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建制化速度加快，許多以教學為主的科系紛紛成立，擺脫過去研究中心的編制型態，成為一種專業學科。

1980 年代初期，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建構的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領域，普遍於英國境內擴展開來，許多研究中心紛紛成立。這些研究中心有些附設在學系之中，例如，歷史最為悠久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屬於伯明罕大學的英國文學系；有些研究中心則是各自獨立的，例如，University of Leeds 的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然而，這種研究中心編制是以研究為主要任務，招收碩士班以上之研究生，不定期地出版研究報告。1980 年代中期以後，有愈來愈多的媒體與文化研究以系為名，成立大學部，招收學士班學生，擺脫過去以研究為主的型態，兼具課程教學與學術研究任務。

從學術建制來窺見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發展，可由科系的學院類屬與研究者的興趣專長顯見端倪。大體說來，英國大學有五種學門會從事媒體與文化研究。首先，是純粹以媒體研究為主，文化研究為輔的學系，例如，倫敦大學的 Goldsmiths College。其次，專注文本分析的文學科系也設立媒體研究的學位，不過，它們更加重視媒體再現的過程和影像或形像（image），這些科系絕大多數屬於文學院，研究者背景則來自文學，例如，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在英國文學系中設有文化研究課程與學位。

同時，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學位也設於社會學系之中。很顯然地，研究者從媒體產製過程和閱聽眾分析的角度，來研究媒體的社會性議題，例如，University of York 的社會學系，分成兩個領域：流行文化與社會研究，相當注重閱聽眾取向。同時，媒體與文化研究課程也普設於以文化研究為名或其他名稱的科系當中，例如，University of Coventry 關於媒體、傳播與文化的課程，或是 Liverpool Moores University 的媒體與文化研究學位。最後，亦有大學以交互學門方式設立媒體與文化研究課程，例如，University of Lancaster 的媒體與文化研究課程，是由社會學系、哲學系和英國文學系合開的，完全重視理論性的研究。

另外，從研究者的興趣專長為著眼點，也是另一個瞭解英國媒體和文化研究學術建制值得參考的方式。由於特殊專長與興趣決定其研究領域和背景，自然也就確立其所能任教或研究之學術單位，例如，具有傳播科技與女性閱聽眾研究專長的 Gray，適合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積極發展其具有社會學特色的文化研究之長遠目標。即便如此，有些學有專精的研究者卻獨樹一格，在非媒體或文化研究科系任教，例如，近年來戮力傳播科技與消費理論和電視與每天生活理論建構的 Silverstone 曾在 University of Sussex 的 School of Cultural and Community 擔任媒體研究教授，再如，隸屬倫敦大學的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的社會心理學系，聘請了以廣播電視政策與國族認同為專長的 R. Collins 擔任教職。

這些具有媒體研究興趣和專長的研究者，似乎在一個與他們僅有些許相關的學門中任職研究，與其他同僚的專長幾乎完全不同，可說是英國學科劃分中深具包容性的最佳例證。除此之外，在其他未設有與媒體或文化研究學位的學門中，也有研究者的專長和興趣是媒體研究的。例如，University of Durham 的社會學和社會政策學



系中，D. Chaney 的主要興趣就在媒體研究，他曾以社會人類學儀式化的觀點論述媒體如何聯結人們的每天生活，近來更完成討論文化研究與社會學關係的論著。再如，以媒體與社會理論見長的 J. B. Thompson 任職於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的 Jesus College。

雖然 Morley (1992) 曾經感觸良多地論道，一方面，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不若北美傳播研究重視理論探索，而是重視主體藉由媒體文本與科技實踐的特質；另一方面，出身社會學的文化研究者在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領域中，不如文學出身的媒體與文化研究者那麼引人注意，因此屈居邊緣位置。但是，如果從 Hoggart、Williams，與 Thompson 等三人開始的英國文化研究傳統加以觀察，就可發現他們的共同點在於論述不同社會群體的主體建構過程，基本上，這個觀點已經脫離文學而擴展至社會學與人類學關切的範圍。特別是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1988 年從文學院轉歸於商學和社會科學院 (The Faculty of Commerce and Social Science)，獨立成為文化研究學系，並且設立大學部，不但使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正式邁向社會學與人類學，同時藉由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試圖成為一種專業學科。

在回顧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建制的發展之後，可以再由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出版品窺見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軌跡。由於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僅由英國的 Penguin 出版社給予有限的財力資助，它並不像其他英國大學的研究中心擁有企業或財團的支持，所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或研究生的論文都是以油印方式 (stenciled papers) 出版，根據研究中心各個小組的編制，區分成不同研究領域的出版品，例如，理論與方法、教育、種族、流行文化與次文化、職業與工作、女性研究，以及媒體研究等。<sup>22</sup>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有出版社與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合作，例如，在英國 MacMillan 出版社的資助下，Hall, et al. 的

*Policing the Crisis* 在 1978 年問世，再如，得到英國 Unwin Hyman 出版社的協助，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1980 年出版 *Culture, Media, Language* 的論文合集，主要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介紹，內容包括民族誌、媒體研究、語言，與英國文學研究等，不但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菁華，同時也是英國文化研究發展中期相當重要的學術論著。

然而，絕大多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論著，都以油印或影印再集結成冊的方式問世。例如，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1981 年與同校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合作的 *Sporting Fictions*，主要論述運動與媒體再現的議題，操作領域涵蓋兒童文學、戲劇、電影、電視、小說，與詩集等。再如，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與英國威爾斯的 Clwyd Media Studies Unit 合作，由 C. Points (1985) 主編的 *Working Papers for Media Studies*，主要內容分為兩個部份，一是理論探索，另一是個案研究，操作的媒體場域包括報業、電影、閱聽眾、連環圖畫，與廣告等，討論的議題涵蓋階級、性別與種族等，是相當重要的媒體與文化研究合集。然而，這些論著均是以影印合訂本的方式出版，並沒有出版社的資助與支援。

此後，由於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文化研究各個領域的開展，愈來愈有學術的貢獻與創見，同時，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學術建制擴展之後，許多課程需要編撰並出版教科書，例如，Open University 開設「大眾傳播與社會」的課程，為要編撰教科書，由 M. Gurevitch, et al. 與英國 Routledge 出版社合作，於 1982 年出版涵蓋英國媒體研究主要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分析、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的重要論著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1990 年代以後，許多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的論文經常被收錄於論文合集之中，包括 L. Grossberg, et al. (1992) 的 *Cultural Studies*，或是 A. Gray and J. McGuigan 分別在 1993 年與 1997 年出版的 *Studying Culture* 第一版與第二版，均由

Routledge 出版社印行。

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1988 年更名為文化研究學系之後，研究與學術論文迅速減少。過去研究中心編制主要是由研究員與研究生出版大量的學術研究論文，但是成為大學專業學科的文化研究學系，必須擔負教學重任，除了每年少數的學士、碩士，與博士論文之外，就是文化研究學系教師發表的專書與文章。為了重整旗鼓，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從 1990 年代開始，每個學期的每個星期二，邀請各個文化研究領域內的學者專家至系上演講，並定期舉辦多次學術研討會，同時與英國 Russell 出版社合作，不定期地出版新的學術刊物 *Cultural Studies from Birmingham*，目前已出版 4 期，主要目的是作為文化研究學系師生研究與學術論文的發表園地，同時亦作為該系師生學術研究的通訊管道，內容仍然涵蓋階級、種族、青少年、性別，與媒體等研究領域，為廿一世紀邁開新的步伐。

## 陸、結 語

文化研究被引介至台灣已超過十年，但是由於不同學門的關切重點有異，加上對英國本身的發展瞭解甚少，導致對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以及其所擴展開來的學術領域，仍然處於霧裏看花的窘境。特別是在媒體與文化研究領域，如果說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是英國媒體研究的濫觴，並不為過，然而，許多英國本土之外的媒體與文化研究者捨棄文化主義的傳統，專注於政治經濟學與文本分析，無法將媒體與文化理論觀點落實於文本讀者或閱聽眾的實踐，與傳統的英國媒體與文化漸行漸遠，理論束之高閣的結果，失去英國文化研究在民間苦心經營的反抗動力，最終喪失英國文化研究者以流行文本與媒體作為工人階級、女性與青少年主體，以及處

於邊緣位置的種族團體，與主流文化和中心價值妥協與鬥爭的場域。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在回顧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如此龐雜的領域時，仍有個人的觀察與立場。或許這正是一個起點，應可為媒體與文化研究提供若干反省思考的空間，同時釐定新的研究計劃與藍圖。

## 註 解

- 1 伯明罕大學的文化研究學系在 1997 年 5 月更名為文化研究暨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以原有文學與社會學背景師資，繼續運作。
- 2 雖然 R. Hoggart 對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響之深不及 R. Williams 與 E. P. Thompson，但作為一位學術建制的創始者，R. Hoggart 是直到目前仍健在的文化研究始祖之一，曾在 1997 年伯明罕大學的校友會刊物 *Birmingham Magazine* 上回憶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創建過程。
- 3 過去以菁英為主的英國大學教育，不但排除媒體或流行文化的學術研究，而且限制工人階級子弟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在二次大戰後有相當程度的改善，許多工人階級子弟，如 R. Hoggart 與 R. Williams 因獲得政府獎學金而有機會進入高等教育系統，展開對英國菁英學術的批判與反動。
- 4 S. Hall 使用的方法是，一方面大量閱讀歐陸文學與文化理論者的著作，如 L. Althusser，另一方面則是不斷地邀請歐陸的文學與文化理論者，至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演講，包括 J. Lacan、R. Barthes 與 U. Eco 都曾經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留下他們的足跡。例如，R. Barthes 在 1973 年提出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

*tural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論文。

- 5 雖然早在 1977 年，R. Nice 即開始藉由翻譯介紹 P. Bourdieu 的觀點，如 *Translat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 Culture Field and the Economic Field* 至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但關於 P. Bourdieu 的許多概念在 1990 年代之後才陸陸續續受到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閱聽眾分析的重視。此外，R. Nice 是專門研究 P. Bourdieu 的重要英國學者，P. Bourdieu 的著作紛紛被介紹到英國，他的確功不可沒。
- 6 這是 P. Bourdieu 相當重要且具有影響力的著作，它的法文原版在 1979 年出版，但英譯版直到 1984 年才正式問世，由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R. Nice 翻譯。
- 7 至今，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仍以種族、階級、性別、青少年，與媒體研究取向為主軸，必須注意的是，這五個研究取向經常相互滲透，絕大多數的研究作品都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取向。
- 8 伯明罕周圍的衛星城鎮，例如，位於伯明罕西南方的 Dudley 盛產煤，而工業革命發源地 Telford 則位在伯明罕的西北方，從工業革命之後，伯明罕及其附近城鎮就是匯集工人階級社會群體的主要地區。
- 9 事實上，這個借用過程並非 D. Hebdige 所獨創的，早在 J. Clarke 在對英國青少年次文化，如 Skinheads 的分析中便已使用。J. Clarke 將任意拼湊當作是青少年次文化特別在時尚方面用以改造、顛覆與延伸的方式。
- 10 其實，D. Hebdige 的借用過程仍然並非獨創的，P. Willis 早在關於嬉皮（Hippies）和飛車黨（Motor-Bike Boys）的青少年次文化研究中就使用過，而在 *Profane Culture* 中，P. Willis 更表明次文化顛覆流行神話，自創井然有序的風格。
- 11 這些移民分別來自亞洲、大洋洲與非洲，英國允許這些有色人種

的移入，純粹是經濟勞動因素考量，也是歷史情境造成的結果，這些移民被英國政府限額、限制居住地及限制工作。

- 12 原本就有自己教育與貨幣制度的蘇格蘭在 1997 年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在倫敦之外的愛丁堡（Edinburgh）設立議會，重新掌握法案的審查與徵稅的權力，這代表著目前仍保有皇宮的蘇格蘭人，隨時都在進行著脫離英格蘭人統治的準備。至今，許多蘇格蘭人仍然不認為自己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成員，雖然他們的語言早已流失，在 1996 年 8 月於蘇格蘭第三大城亞伯丁（Aberdeen）的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舉行的電影、文化、歷史（*Film, Culture, History*）學術研討會中，該校文化歷史研究小組（Cultural History Group）的領導人明白指出：「我們在此是絕口不談英格蘭文化研究的。」
- 13 原因在於威爾斯皇室是在 13 世紀時被英格蘭殲滅，但是蘇格蘭是在 18 世紀時才以議會投票通過方式，同意與英格蘭合併，這個歷史過程導致威爾斯無論在教育或貨幣制度下，往往深受英格蘭影響，此外，由於威爾斯人在政治與經濟權力上，遠不及於蘇格蘭人的強勢作為，使得威爾斯人更加處於不利地位，例如，1997 年威爾斯同樣與蘇格蘭一樣獲得倫敦國會同意，以公民投票方式表達人民意見，但威爾斯人仍然決定還是聽命於英格蘭，更明顯的事實是，威爾斯人也不像愛爾蘭人以實際的抗議行動反對英格蘭人的統治。
- 14 最根本的理由還是以北愛爾蘭兩大都市貝爾發斯特（Belfast）和倫敦德里（Londonderry）為主的英格蘭裔，掌握絕大多數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由於實際抗議行動的持續進行，使得英格蘭的學術單位向來排除關於蘇格蘭或威爾斯的研究（當然，這在蘇格蘭或威爾斯的大學中相當普遍），卻對愛爾蘭情有獨鍾，例如，英國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學系設有愛爾蘭研究小組（Irish Study

Group ) 。

- 15 目前任教於伯明罕代學文化研究學系的 D. Parker，因為中英混血背景使他對居住在英國的華裔移民具有強烈興趣，D. Parker 的博士論文就是探討倫敦、伯明罕及曼徹斯特中國城華裔移民的種族與國族認同。D. Parker 在這篇研究中，以開放式的問卷調查方法，長期與中國城華裔移民相處，他的主要訪談對象是中學生，詢問他們在語言、教育資源、未來前途，及對英國國族認同的問題。D. Parker 主要興趣在於這些處於英格蘭文化邊緣地位的華裔青少年，如何認同自己的母文化，又是如何與英格蘭文化妥協，產生自己的次文化。D. Parker 的博士論文已由英國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
- 16 S. Hall 與 P. Gilroy 的論辯主要以 *the New Left* 期刊為戰場。
- 17 這個期刊是英國媒體研究的重鎮之一，事實上，它是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研究者的主要發表園地。
- 18 這本書其實是 D. Hobson 的博士論文。D. Hobson 是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相當活躍的女性議題與媒體研究者，有不少相關論著。然而，她與 J. Ellis 一樣，在取得學位後從事廣播、電視與電影媒體的實務工作，並沒有朝學術研究發展，導致許多人對她極為陌生。
- 19 歐陸許多國家的大學設有媒體研究科系，如荷蘭的 University of Amsterdam、丹麥的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以及挪威的 University of Bergen 等，她們因與英國地理位置極為接近，學術交流頻繁，相互影響，如 1996 年一項規模相當龐大的關於媒體、性別與青少年議題的學術研討會 *Media Landscapes across Europe: Structures, Identities and Youth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就在丹麥的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與 University of Roskilde 舉行。
- 20 民族誌方法最早由 P. Willis 從人類學引進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目的是要對過於注重變型的次文化文本分析，尋求一個更符合社會實踐的研究方法，後來為媒體與文化研究者採用，進行大量研究。

- 21 關於傳播科技改變人們的空間與時間概念，早在 1960 年代便由加拿大傳播學者 M. McLuhan 提出，但是如同 R. Williams (1974) 在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中的理論性觀點一樣，必須要等到後來更多的經驗性研究加以證實。請參考 M. McLuhan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22 最顯著的例證是，與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僅咫尺之遠的電子與電機工程學系，在 1997 年興建新的研究中心，完全是由企業與財團捐助，舉凡所有的儀器、設備與師資都由這些企業和財團負責，花費將近數億英鎊，或許這是學術現實的一面吧！

##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Books.
-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 Ang, I. (1989) 'Wanted: Audiences: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Studies', in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Ang, I. (1995) 'The Nature of the Audience', in J. Downing, et al. (eds)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Barthes, R. (1973)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6.
- Bourdieu, P. (1972) 'The Berber House', in M. Douglas (ed.) *Rules and Mean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 Tast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aham, P. (1982) 'How the Media Report Race',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 Brunsdon, C. (1981) 'Crossroads: Notes on a Soap Opera', *Screen*, 22.
- Brunsdon, C. and D. Morley (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Buckingham, D. (1987) *Public Secrets: East Enders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Buckingham, D. (ed.) (1993) *Reading Audiences: Young People and the Med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utcher, H., et al. (1974)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edia*,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31.
- Carby, H. (1979) *Multicultural Fictions*,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58.
- Cardiff, D. and Scannell, P. (1987) 'Broadcasting and National Unity', in J. Curran, et al. (eds) *Impact and Influences: Essays on Media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d.) (1978)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d.) (1982)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1981) *Sporting Fictions*, Birm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Chambers, I. (1986) *Urban Rhythms: Pop Music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 Clarke, J. (1974) *The Skinheads and the Study of Youth Culture*,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s, No. 23.
- Clarke, J. (1975) *The Three Rs: Repression, Rescue and Rehabilitation: Ideologies of Control for Working Class Youth*,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56.
- Clarke, J. and Jefferson, T. (1974)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ulture and Sub-Culture*,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14.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Harmondsworth: Peregrine.
- Gillespie, M. (1995)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Hutchinson.
-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Books.
- Gray, A. (1987) 'Behind Closed Doors: Video Recorders in the Home', in H. Baehr and G. Dyer (eds) *Boxed in: Women and Television*, London: Pandora.
- Gray, A.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 Gray, A. and McGuigan, J. (1993)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1<sup>st</sup>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Gray, A. and McGuigan, J. (1997)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Green, A. (1979)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lack Labour and the Racial Structur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62.
- Griffin C. (1982) *Cultures of Femininity: Romance Revisited*,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69.
- Grossberg, L., et al.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Hall, S. (1968) *The Hippies: An American Moment*,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16.
- Hall, S. (1971) *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11.
- Hall, S.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7.
- Hall, S. (1975) *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34.
- Hall, S. (1977) 'Cultur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 Curran, et al.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

- nold.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 Hall, S. (1986)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R. Collins,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 Hall, S. and Whannel, P. (1964)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Pantheon Books.
- Hall, S. and Jefferson, T.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Hall, S., et al. (1979)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 Hall, S., et al.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 Hall, S, et al. (1981)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in T. Bennett, et al. (eds) *Popular Television and Film*,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WPCS 9.
- Hartley, J. (1987) 'Television Audiences, Paedocracy and Pleasure', *Textual Practice*, 1(2).
- Hebdige, D. (1971) *The Style of the Mods*,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s, No. 20.
-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 Heck, E. (1974)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Media Messages*,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10.
- Hobson, D. (1978) 'Housewives: Isolation as Oppression', i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d.)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 Hobson, D. (1980) '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ethuen.

- Hoggart, R. (1957) *The Use of Literacy*, London: Penguin.
- Hollands, R. (1985) *Working for the Best Ethnography*,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79.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 Johnson, R. (1983)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74.
- Kuhn, A. (1984) 'Women's Genres: Melodrama, Soap Opera and Theory', *Screen*, 25(1).
- Lawrence, E. (1981) *Common Sense Rac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Race Relations*,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66.
- Leal, O.F. (1990) 'Popular Taste and Erudite Repertoire: The Place and Space of Television in Brazil', *Cultural Studies*, 4(1).
-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cRobbie, A. (1978) *Jackie: 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53.
- Millum, T. (1975) *Images of Wome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Moore, S. (1988) 'The Box on the Dresser: Memories of Early Radio and Everyday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1).
- Moore, S. (1990) 'Texts, Readers and Contexts of Reading',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
- Moore, S. (1991) 'Dishes and Domestic Cultures: Satellite TV as Household Technolog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 Moore, S. (1995) *Interpreting Audiences: The Ethnography of Media Consumption*, London: Sage.
- Morley, D. (1974) *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 Morley, 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 Morley, D. (1989) 'Changing Paradigms in Audience Studies', in E.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Nice, R. (1977) Translat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 Culture Field and the Economic Field*,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46.
- O'Sullivan, T. (1991) 'Television Memories and Cultures of Viewing, 1950-65', in J. Corner (ed.) *Popular Television in Britain: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Points, C. (ed.) (1985) *Working Papers for 16+ Media Studies*, Birm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Radway, J.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Books.
- Silverstone, R. (1990)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Media Research*, London: Sage.
-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Van 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 Wajcman, J. (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Williams, R.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Schocken Books.
- Willis, P. (1974) *Symbolism and Practice: The Social Meaning of Pop*

- Music,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13.
- Willis, P. (1978) *Profan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illis, P. (1980) 'Notes on Method',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 Winship, J. (1980) *Advertising in Women's Magazines, 1956/74*,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65.
- Winship, J. (1981) *Woman Becomes an Individual: Femininity and Consumption in Women's Magazines, 1954-69*, Birmingham: CCCS Stenciled Paper, No. 65.